

钱

• 权

• 情

• 系

列

小

说

王跃文 刘震云等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官场



故事

钱
•
权
•
情
•
系
列
小
说

官场故事

王跃文 刘震云等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· QUAN · QING XILIE XIAOSHUO QIAN · XIAOSHI · XIAOSHUO · AOSHUO

钱 · 权 · 情 · 系列小说

官场故事

王跃文 刘震云等著

责任编辑：陈新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7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0

字数：461,000 印数：31,001—36,000

简易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 } 7-5404-1841-9}{1 \cdot 1468}$ 定价：23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 录

权力的成本	1	钟道新
秋风醉了	87	刘醒龙
官 场	150	刘震云
向上的台阶	212	周大新
跑 官	308	田东照
一个乡长的来信	362	张 继
亮 相	417	祁 智
老 秘	470	郑彦英
本乡有案	517	彭瑞高
夜郎西	567	王跃文

钟道新

权力的成本

第一章

下班的时间到了，人们纷纷从北京城区机关大楼中涌出，奔向温暖的家。到了家之后，他们将安定下来，汲取能量，收发信、创造爱情，过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。

副区长金冶走到他办公室的窗前，在尽量拉伸着颈椎和腰椎的同时，向外瞭望。区政府大楼的对面是刚落成不久的高达三

权力的成本

十层的京韩宾馆。

顾名思义，京韩宾馆就是中国和韩国合资的企业。但金冶固执地认为这种合资只是名义上的：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，不是根本没到位，就是来大陆打一个晃又回去了。更有甚者，某些所谓的“外资”，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，通过某个中介机构，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，然后再进来。之所以这样作，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。可在这一进一出中，许多国有资产就被消弥于无形了。而推原论始，这是一种歧视本国的企业的政策。他曾经在几次会议上谈到过这个问题。可惜人微言轻，没有引起重视。但他相信，总有一天，这种政策会像歧视本币的外汇券一样被取消。

京韩宾馆显然在召开一个大型的宴请活动，门口的各种型号的轿车在十分钟内，猛然增多。客人们都被若干旗袍在瑟瑟秋风中飘扬、美丽动人的迎宾小姐迎了进去。

这显然是一个规格不低的活动。金冶观察着那一列列排气量大都在3.0以上的高级轿车。这些在夕阳的照耀下，闪闪发光的车，都有车载电话天线等外在的权力标志不说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车牌号几乎都属于“A”系列。

民间的富贵者，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往往会花大价钱，购买“888”“618”等和“发”字谐音的号码。但此类号码的资源有限不说，也相当幼稚，就像手持移动电话招摇过市一样：真正的富豪，从来不自己打电话的。同理，真正的掌权者，只要选择某个字母，然后规定在这个字母以下的车辆，过任何关口、在任何停车场都不交纳任何费用，并且可以在不允许左转的地方左转，在不允许掉头的地方掉头。

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，集合在这个特定的

地方？金冶放纵自己的想象。据说一只雌蛾放出一点点暧昧难解的蚕蛾醇，就会立刻使得方圆若干公里内的雄蛾身上的绒毛颤动，并以莫名其妙的热情顶着风飞向发源地。据说一只雌蛾释放出的蛾醇，能吸引来一万亿只雄蛾。当然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不知宴会召集客人，释放的是什么醇？

宴会从来不能解决什么问题，它只是一种仪式、一种荣誉。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宴会更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：人数一超过五十，多大的厅堂，也会成为噪音之海。

金冶终止了想象，回到了桌子前。

他今年四十三岁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健全。他已经过世的父亲是搞“学运”出身，解放后在一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，后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，也就是说是个中级干部：北京所谓的中级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中级”。因为北京的干部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到在外地称之为“高干”的地市级，在这连辆车也没得坐。

他属于那种听话且能干的人，早在“文革”前上初中时，就入了团，并很快当上了初中团支部书记。他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，在那里唯一能骄人的就是学习成绩，并没有很多人想当干部，因为学生干部要干许多杂务，显然会影响学习。可他却认为这些杂务能锻炼人的办事能力，就把苦差当乐事来作。文革一开始，他顺理成章地当了“保皇派”，不很积极地参加了运动。

后来他第一个报名去插队，并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。这个要求被顺利允许，他就到了陕西延安县。在没人管的“广阔天地”里，他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应用，很快成了插队青年的杰出榜样，甚至代表陕西省八万知青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，和戴着白毛巾但抽“牡丹”烟的“永贵大叔”签订了一份题为《扎根农村五十年》的合同——当然当时不叫“合同”而叫“协议”——但三

权力的成本

年后，毛主席在京城再发最高指示：“大学还是要办的，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。”他再次马上响应，并被顺利推荐到北京工业学院。

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投机。但又无法从逻辑上找出错误：哪一回他不是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？这一次也是为了完成“上大学、管大学”的政治使命而去的。县里给他们这批派去占领上层建筑的“首届工农兵学员”举行了非常热烈的欢送仪式。在此仪式上，他声泪俱下地表示学成之后，一定再回来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。

但毕业后，他就被留校当了教员。任何人也没想起他当初的誓言：没有什么比群众更健忘的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群众没有记忆，他们有的只是情绪。

他只在学院呆了一年多，就坚决要求下基层锻炼。领导上先是表扬，然后就批准了。于是他去了南方一个大兵工厂。兵工厂的领导让他去技术科，但他要求去车间。

在车间他当上了班组技术员。这一干就是三年。

在这期间，他工作得非常认真，每一张图纸，哪怕是草图，他也画得一笔一画的。每天别人下班之后，他就把车床擦洗得一尘不染，地也扫得干干净净。起初别人还嘲笑他，认为他在哗众取宠，但慢慢地大家都习惯了。以致于他去结婚度蜜月的几天中，班组里的工友们看着渐渐肮脏起来的地，深切地怀念起他来。

如果说以前他的行为中有随波逐浪的因素、投机取巧的因素的话，在这个阶段，他完全是主动的，所有的决定都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。支持他的是这样一个想法：中国实在是太乱了，然而乱极则治。等到治时，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文化和实践经验的人。具备知识文化的人不少，有实践经验的人更多，但二者都有的人，

却没多少。而我就是。

他这种即使现在看起来依然深刻的想法，一方面来自他读书的体会：插队前，他就读过《赫鲁晓夫时代》、德热拉斯的《新阶级》，当然还有毛主席的书。读毛主席的书，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为了应景而读，而是真的读。读后他深感毛之伟大：只有他，才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和该如何管理。插队中，他读得就更加庞杂了：文学的、历史的、哲学的。他是一个读书为用的人，勤于思考又能结合实际。所以没有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成为“书本读得越多越愚蠢”的纯知识分子。

另外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：父亲作为一个党内知识分子，能读到并读懂许多高级的党内文件，并亲历多次运动。所以在他得知自己得了肝癌后，把化验单藏进口袋，就对唯一的儿子以非系统讲座的方式，一点一点的给他讲解政治的原理和技术——后一点在公元一九七六年前，是非常不容易听到的。

所有这些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，自然也就奠定了他的行为基础。

他的这个想法和现在一些情况非常相似：有的人有梦想，但没资金；有的人有资金，但没梦想。如果你两者都有的话，你就是一个发大财的人。

由于他办事一丝不苟的态度、处理事情的公平和杰出的组织能力，一九七七年他就成了生技科长，再一年就成了副厂长，然后是市国防科工委办公室主任，市经委业务部部长。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。

在业务部长任上，他作为中方代表团的随员，和一个世界银行组织的多国代表团进行谈判。在谈判的过程中，日方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欲望，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，我方却不太积极。

权力的成本

“日本是资本主义，而资本主义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。更何况他们和咱们从清朝起就有仇。”这些说法在私下里涌动，控制着整个谈判过程。

就在谈判进入尾声时，金冶去了主持谈判的国家经委丁副主任的房间。

丁副主任的秘书是一个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他一副“司空见惯浑间事”的样子，以“首长已经准备休息了”为理由挡驾。

金冶挥挥手，厚厚的卷宗，说有重大问题要汇报。秘书板起门神般的面孔，官声官气地说：“无论多重大也得等明天。”金冶说：“明天丁副主任不就要离会了吗？”“你可以去办公室找。”

金冶仍然坚持要进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丁副主任回到国家经委的话，他这一级的官员是根本见不上的。

喧哗声惊动了丁副主任，于是他被放了进去。

丁副主任确实准备休息了，已经洗完澡，穿着自己的睡衣和皮拖鞋在外间侧着头看报。“有什么事啊，小伙子？”

丁副主任的语气和蔼，并示意金冶坐。在中国的高级官员中，他向以“工业派”著称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正在上海读书的他，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。读完抗日军政大学，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业部门工作。

当时边区的工业除去纺织、粮食加工、机械修理外，几乎没别的。但就是这点少得可怜的工业，规划出他一生的轨迹：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，他就被派到东北负责水电。东北的工业基础甚是雄厚，中央还在延安期间，党内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出：谁得东北谁就得中国——这虽然和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的古训相反，却是一个真理——他在东北期间，掌握了真正大工业的管理知识。再以后他就到了上海，负责纺织。这时他已经是第一负责人了——

这是一个很风光的位置，相当曹雪芹的祖上当过的“江宁织造”。

其时，他三十岁出头，风华正茂，突飞猛进，很快负责起整个上海工业的工作——当时上海工业就几乎是中国工业的代名词——但遗憾的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和来华支援的苏联专家在工业政策方面发生了冲突。

此刻正是中苏关系的“蜜月”，斯大林由从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到承认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，再到支持中国共产党，已经过了三个阶段而达到顶峰。如果有什么人在这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、以什么方式妨碍中苏关系，其后果都是不言而喻的；与政治利益相比，任何利益都是小利益、局部利益。他很快就被撤职。

就在他几乎被一撸到底时，一个他过去的老首长拉了他一把。让他到他主管的国家经委当了处级巡视员。再以后，中苏关系冰封，大庆油田开发，他就去了石油战线。

工业不同于政治，起码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科学来管理。他得到了舞台，并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经验，职务很快恢复，还略有提升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已经到了北京的他被大庆的工人拉回去“专政”。等他再回来时，一只眼睛已经瞎了。

一九七六年后，他重新回到经委，负责规划工作。这个时期的规划工作是没办法搞好的。当时的中央负责人雄心勃勃，使用“只争朝夕”的精神，“大跃进”的方式，试图再建中国。于是乎，一套根据这种思想制定的宏伟规划出台了。但这些规划无论从国力还是从全国布局上看都是相当不合理的。但这次他没有正面对抗，而是用“称病”的方法消极对抗。于是在日后清算时，他与“凡是派”无任何瓜葛，因之得以在一九七九年再次出山。

有关丁副主任的故事，金冶听说过不少，所以他敢贸然闯关。

坐定之后，他马上说：“首长的时间宝贵，我现在就汇报一下吧。”

他汇报的核心就是：日本是一个务实的国家，统治日本人思想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。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。他们不会用资本主义、共产主义这样纯粹属于意识形态的分类方法来看待世界的。

丁副主任眯起仅存的一只眼睛，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。等金冶要言不烦地说完后，大约一分钟，他才问：“日本人也和咱们一样：不管它白猫黑猫，逮着耗子就是好猫？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？”

金冶点点头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丁副主任把报纸叠起，眼镜摘下。

金冶表示没什么事了。

“咱们聊了半天，我还不知道你在什么部门工作，姓什名何呢？”就在他准备告辞时，丁副主任问。

金冶把自己的姓名、工作单位告诉了丁副主任。虽然他不太相信丁副主任能记住。

丁副主任说了两声“好”，金冶就退了出來。

第二天，丁副主任继续参加会议到完。

虽然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，但与与会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。用丁副主任在结束会上的话说：“解放城市、解放台湾、解放这、解放那，数解放思想难。”

丁副主任也没有忘记金冶，大约在两个月后，就把他调到国家经委非生产经营局当处长——国家机关部级单位的处长，比地方局级单位的处长要高出半个格。

一九八五年，深圳向北京要干部。经委人事局推荐了金冶。但丁副主任不让金冶去：“你和我再干上他一两年。等我临下去前再

走吧。”

金冶自然同意：深圳在一般人眼睛中，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好去处。但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淘金者，没必要去。

丁副主任没有食言，在他临卸任前，征求金冶意见后，把他推荐安排到北京城区当了副区长。

金冶把桌子上的材料打开，开始仔细阅读：白天的时间，他几乎被会议、应酬和外出检查等占领，文件只能下班后来读。文件是权力网络中的主干道，上级的精神和民意的综合都在其上传送，是他每日必修的功课。

他来城区已经三年了。用他自己对妻子说的话来形容：“三年辛苦不寻常。”初来时，区委书记让他负责卫生、计划生育等工作。用普通眼光来看，这些工作是很没有“油水”的杂务，也很难作好。但他认为“官”就是管“事”的，而“事”没有好坏之分，只要管得好，“官”就可以往大了做。所以桩桩件件作得有声有色，几次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奖。

在此期间，他牢牢记着机关的箴言：城区无小事。

这是无数人从无数经验中总结出来的。因为有许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居住在城区。比方从某个机关传出一条指示：把卫生搞好。或者从某个领导那里下达一句类似的话——更要命的是后者——而你闻之不动，或没有动到他认可的程度，其后果往往是很不堪的。

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类似的事，而被迫在换届时提前退休的。当然所谓“提前退休”不过是提前了两个月。可如果你朝中有人——这个“有人”是广义的，不专指你是某个人的儿子、亲戚，因为这些都是宿命的。而是指上面有赏识你的人，这种赏识是因为你的工作而产生的——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，于是

权力的成本

你就可以再干一届。一届就是四年。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。这个北京大学一九五三年的毕业生平素滴酒不沾，但在那次只有区领导参加的送旧迎新的宴会上居然喝醉了。他举着酒杯和金冶狠命碰了一下后说：“清朝有句俗话：三生不幸，知县附郭；三生作恶，附郭省城；恶贯满盈，附郭京城。你不是北京大学毕业的，你是学工程的。也许不会懂这句话。但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干上三年五年，就会明白了。”

金冶虽然不是北大毕业的，但这话还是懂的：所谓的“知县附郭”，就是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，这样他的一举一动，都要受到牵制，完全没有了“父母官”的威风。“附郭省城”就是知县、知府、巡抚同在一城。附郭京城就不用说了。可金冶是喜欢用“两分法”来考虑问题的：任何坏事从某个角度讲也是好事：如果你的卫生工作作得好，或者绿化得好、治安搞得好，与别的岗位上相比，“回报率”要高得多。

但这所谓的好，也不是一味的奉承。去年区里的某个部门负责人向他请示：有个公司想出些钱，在公园里建一座寿星塑像。他起初没在意，顺口问：这要多少钱？回答是含糊的：大约三十万到五十万的样子。他一听就生气了：三五十万到这些人嘴里，怎么就和说三五块钱一样？但他没有发火：城区无小事，所以城区也就无小官。这个机关存在的年代太长了，水也深来根也茂。他只是问：一个寿星就要这么多钱？是不是把公园的占地费也算了进去？回答是：这种好事，公园想干都没机会，还要什么占地费？！金冶知道这个公园是国家公园，虽然在他的管区内，但根本就插不上手。据说某个剧组想拍一部电影，公园开出个价来，把他们吓了一跳：既使把整部电影的经费都给了他们也不够。但这座历史悠久的公园领导是“金口不开，开口不改”，文化部的领导

出面说也没顶用。可这次他为什么这么慷慨报效呢？他装出不懂的样子，随便地往下问。

这个负责人很愿意在自己的顶头上司面前显示自己是有背景的人，几下就把底全部露了出来：资格很老、党内的地位很高的张老，每天都要到这个公园里散步。而今年年底就是他的八十大寿。如果恰恰在当口儿，有一座老寿星塑像适时揭幕，真寿星该有多高兴？当然这塑像不能像一般的英雄塑像一样，弄几吨水泥胡弄胡弄就行，而应该用真料，也就是铜质塑金。

金冶再次装傻：他不是已经休息了吗？

负责人是一个好为人师者，开始给金冶讲解起“作官”的“三字经”来：有些人虽然在位，但没有权力；有些人虽然已经休息，但依然很有权力，甚至权力比以前还要大。权力不是职务给子的，权力是影响力。所以让他高兴，是没有坏处的。他还从“人”的角度解释说：老人返朴归真，就和孩子一样，一哄就高兴。不同的是，他高兴了，分给让他高兴的人的不是糖果，而是权力。

他讲的这些“三字经”金冶起码在十年前就知道，但他还是认真地听下去：毛主席说过，必须要“言者无罪”，才会有“知无不言”。

听着、听着，他就把底细全都摸清了：张老的办公室主任，现在在一个重要的部门任职，寿星像一说就源于他。而那个出钱的公司领导，则是张老原来的生活秘书。

金冶认为这种事是不能干的：如果干了，某些领导可能会喜欢，但老百姓却肯定不喜欢。如今的城市里，什么都不缺，唯独缺少绿地。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公园，更是大家喜欢的地方。他就不止一次地看见许多家人，带着孩子在绿地嬉戏。这幅《天伦作乐图》是任何见过的、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忘记的。

权力的成本

但他没有正面否决这个动议，而是把它拿到区委会上去讨论。这个讨论也不是正面的，因为他知道如今就是最机密的会议，也不能保证完全不走漏消息，而且往往是越机密的走得越快。因为如果把消息比喻成商品的话，越机密的也就越紧俏。他只是在区委会提出：把“寿星问题”提交给区人大去讨论。

区委书记如果不是“心照不宣”的话，也是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立刻同意了他的动议。

“寿星问题”很顺利地在大会上被否决。

“人大”不是“区长办公会”也不是区委会，在这种会上，代表们的一票，和主任的一票，有着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。所以一个议案，如果在“区长办公会”或区委会上被否决的话，还会有人来找区长或书记，但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什么问题去找人大主任的。所以金冶认为“人民代表大会”确实是伟大的发明。当然，人大会议上的重要议程都是经过区委会审定，起码也是和区里的主要负责人私下里碰过。

“寿星问题”的圆满解决，奠定了金冶在区委书记心目中的地位，所以在常务副区长上调后，他就替补上来。

等他把文件都读完之后，对面京韩宾馆的宴会已经散了。

第二章

一上班，金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：水利局和电力局的官司。

事情的原委如此：水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，已经立法保护。但在法律颁布之前，市水利局下发了一个文件，每吨工业用水加价一毛钱，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和保护。但电力部门不干，他们有自己的理由：电价是国家控制的，一分钱也不能涨。所以如果水涨

电不涨，他们无法消化。

“你能不能让一让？”金冶上来就先对水利局长说。

水利局是城区政府直接管辖的，所以要先拿自己人开刀。

“不行。”水利局长回答得很干脆，“市水利局的文件您一定看过。”

金冶点点头。

“这个文件市政府也转发了。”水利局长知道金冶教他让是一个招术：电力是中央企业，也就是说，电力的全部利润几乎全都要上缴中央，地方上只留一点点教育税之类的“小钱”。他们这一级干部——主要是煤、水两家的当家人——经常议论：如果有机会，咱们一定要好好的涨一涨。因为煤、水一涨价，就增加了电力的成本，无形中就把手里的利润给拿了回来。

这个想法得到了城区的领导们的赞同：有谁不愿意自己手里的权力大一些呢？当然这里指的权力主要是经济权力。干部、司法等大权，是不容讨论的。可经济权力的大小，关系到全区人民生活的好坏：如果区财政有钱，就可以给老百姓增加工资、副食补贴，可以盖学校、医院、托儿所。对此区委刘书记有一句名言：手里没有米就叫不来鸡。

“市政府并管不了电价。”电力局长本来想说：管不了我们电力部门。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来——你说他管不了，也对：电力和铁路一样，是中央直属企业，无论财政收支还是干部管理都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关系。但说他管得了，也对：你的工厂建在人家的地盘上，你的线路也要经过人家的地盘，你的家属要在人家地盘上就医、上学、死亡。而这一切，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，都是无法完成的。所以不能把话说绝。

“电价我们确实是管不了，但你们能不能在企业内部消化一